

克里姆林宫中的生活

● 基洛夫之死

斯大林妻子死之谜

谁加速了列宁的死亡

克里姆林宫中的生活

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 著

宋利平 杜凡 姜秉新 译

姜秉新 校

求实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彩琴

封面设计：王岐

ЛИДИЯ ШАТУНОВСКАЯ
ЖИЗНЬ В КРЕМЛЕ

CHALIDZE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82

(根据纽约查理兹出版社1982年俄文版)

克里姆林宫中的生活

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 著

宋利平 杜凡 姜秉新 译

姜秉新 校

求实出版社出版

北京联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5.625印张125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册

ISBN 7-80033-115-6/D·41

定价2.50元

出版说明

据本书作者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自我介绍，她曾是原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克拉希科夫的养女，由于这一特殊身份，她在克里姆林宫居住多年，之后又一直住在政府公寓，与苏联最上层人物生活在一起，耳闻目睹了20—50年代苏联社会的某些情况。

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这本书，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对了解苏联历史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书中有些观点比较偏激，未必符合实际，请读者自己注意鉴别。

目 录

| | |
|----------------------|-----|
| 在“老布尔什维克”中间..... | 1 |
| 革命后的莫斯科..... | 1 |
| 克里姆林宫和它的新居民 | 10 |
| 鱼从头烂 | 19 |
| 斯大林与“老近卫军” | 23 |
| 新执政者..... | 32 |
| “政府公寓” | 32 |
| 大饥荒年代..... | 41 |
| 报复的时刻..... | 45 |
| 斯大林的党羽..... | 57 |
| 告密者 | 74 |
| 约瑟夫·斯大林的秘密 | 82 |
| 谢尔盖·基洛夫被害 | 83 |
| 葬送医生生命的诊断 | 89 |
| 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死之谜 | 91 |
| 迫害阿利卢耶夫一家 | 98 |
| П·А克拉希科夫的被杀 | 106 |
| 谁加速了列宁的死亡 | 110 |
| “间谍”中心是怎样形成的..... | 115 |
| 米霍埃尔斯——阿利卢耶娃案件 | 115 |
| 苏联排犹的教训..... | 161 |

在“老布尔什维克”中间

革命后的莫斯科

1922年春，当时我只是个年仅18岁的充满热情的姑娘，还是在童年时就对绚丽的戏剧艺术产生了强烈的爱，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口号给我的影响更加深刻。这一年，我在我的故乡奥德萨中学毕业后就离家出走了。当时，我身无分文、只身一人，怀着对新生活和戏剧艺术的理想奔向了莫斯科，来到了这令人神往的世界。

我的少年、青年时代是在极为困苦、难以忍受的条件下渡过的，这一时期经历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在奥德萨，条件就更为艰苦。这个城市的苏维埃政权还未巩固就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乌克兰拉达^①）的政权所取代，之后，红军回来了，不久就是奥德两国的武装干涉和斯科罗帕德斯基里特曼^②乌克兰“独立运动^③”政府的建立，接着红军又回来了，然后就又是白军的占领、法国人的武装干涉，以及红军和白军的交替占领。这些年间，这个城市的政权更迭了不知是11次还是13次——某些政权犹如昙花一现一晃而过。而每一个新政权带来的都是破坏、饥饿、非法迫害、掠夺和谋杀。在

注：① 1917～1919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反革命中央机关。

② 查波洛什哥萨克公选的首领。

③ 资产阶级借口自决而发起的乌克兰独立运动。

那些年，能在奥德萨生存下来是很难的。

我的家庭生活条件非常艰难。我的父母都是教师，他们一生都是在奥德萨的一所社会犹太人的学校里教书。这所学校是靠犹太社会资金、工业财团和富商捐款办起来的。该校实行免费教育，所以校内的学生都是些犹太贫民子弟。为培养他们的经商能力，学校对他们进行普通教育。在当时，对于那些贫穷犹太家庭的孩子来说，这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把经商看作是个正当职业的话，只有那些生活有保障的家庭的孩子才能受高等教育，或自由选择职业。

我的父母是品德高尚、正直的人。对他们来说，学校的工作不仅仅是个谋生的职业，而是要在人民面前完成自己的天职。他们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这一事业。我们住在学校的一套很小的房间里。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一种学校所特有的气氛中度过的。我一来到人世，每天的生活日程就伴随着学校的铃声。学校的日常事务、对孩子们的关心占用了父亲的全部精力，他完全没有实际生活能力，更不会想办法挣钱，所以在国内战争年代，我们是在极为贫困中渡过的，并几乎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大概就是那些年生活条件的贫困，在我成熟后，促使我立志于早年对艺术，特别是绚丽的戏剧艺术的追求。

不过，有机会结识了几位文化艺术家，对我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这些人为躲避布尔什维克从北方跑来，在奥德萨为自己找到一块暂时的栖身之地。他们当中有一位叫阿列克赛·埃克斯捷尔的女艺术家，从前她在巴黎工作过几年，还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切尔涅茨卡娅·捷舍莉娜，我曾在那里学习过音乐，还有阿达舍夫和格拉戈林导演，他们在奥

德萨创立的戏剧专科学校也曾红极一时。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向往着新的“革命”艺术。我们喜欢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尼、古米列夫的诗歌（当然，那些我们并不真正理解），戏剧学院的弗谢沃洛德、麦伊尔霍利德是我们的偶像，他是把献身革命艺术与为社会革命人文思想服务相结合的具体化身，我们每个人也都具有这种思想。

来到莫斯科后，我很快进入了十月革命后建立的国立戏剧艺术学院（ТИГИС），成为该校导演系的学生。同时我开始在麦伊尔霍利德筹办的隶属于他剧院的戏剧专科学校工作。开始这个学校的名称讲起来很绕嘴“ТВЫРМ”，全称是“国立高等导演实习学校”，后来改名为“ТВЫТМ”，即国立高等戏剧实习学校。当时缩写语用法很盛行。如：新建的艺术学校，过去是一所艺术绘画学校，当时叫“ВХУТЕМАСС”，其全称现在我已想不起来了。

那时我完全沉浸在大学生活中、学校和麦伊尔霍利德艺术剧院的工作、戏剧演出和诗歌演讲，还有在综合技术学院博物馆大教室进行的辩论会——所有这些，当时我们没来得及针对文化与政治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总而言之，我们当然都是赞成革命、赞成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正是他们使我们对人类公正理想的追求更接近于现实了。但现实中我们是盲目的，我们没有认清苏维埃政权意味着什么？它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社会工作”对大学生来说是责无旁贷的，我曾在共青团区委会搞宣传工作，给青年工人宣讲党的一系列决议和一些政治事件，其实我当时对所发生的一切也不十分清楚。

在那些年，莫斯科外貌与革命前几乎没什么变化，城市

里的大批教堂还没遭到破坏，通往红场的路上有一座维尔斯基、鲍日娅圣母钟楼，里面总是挤满了祈祷的人们，钟楼下还有一座很大的耶稣基督教堂，但后来按斯大林的旨意被拆除了。

在市中心，现在的莫斯科旅馆和部长会议大厦所在地，原是有的一座二层楼的商店和私人食品店，里面有大量的粮食、各种美味食品，在对面特维尔斯基大街（现在叫高尔基大街）街口有一座圣母院，它旁边是一家著名商人的货栈。

莫斯科的大小街道、莫斯科市区的房屋和宽敞的庭院仍保留着旧日的难以描述的魅力。在几条中心大街上有许多高层楼房，它们都建于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楼房的房间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房间宽敞、舒适。但楼内用暖气的住户很少，因为供暖不足，大多数房间是靠木柴取暖。楼内没有垃圾通道。要是有人想洗澡的话，那么就要用木柴烧热浴池中的水，当然这需有一间没住人的空房。当时莫斯科大多数家庭的洗澡间都是用不住人的房间改装的。但有时人们又需要拆掉洗澡间，在浴池上铺上木板，再铺上被褥，就可把浴池改成床用了。

在石子铺成的大街上，一辆辆四轮马车隆隆驶过——这是个人使用的唯一交通工具。很少能见到汽车，只有领导人才能坐得上。只是后来才在街上看到新生产的小型尖头黑色“列诺”牌出租车。至今我仍记得当时人们互相问着“你坐过这出租车兜风了吗？”其实，在新经济政策年代以前就已出现私人出租车了，这些车的车帮上标有特殊的淡黄色标志，车的窗帘子拉得紧紧的，对那些没有房间幽会的情人来说，这种出租车倒是个好地方。当时没有汽车、无轨电车，

当然更不会有地铁了，整个公共交通都是靠很破旧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上的人总是挤得满满的。

路上的雪是没人扫的，便道上的雪扫到路旁堆成一个个老大的雪堆。临近春天时，这些积雪都发黄了，上面布满了深一道浅一道沟痕，雪一化道路就变得难以行走，雪水顺街流淌留下一道道深深的水沟，不小心踩到里面有时能有没膝深的水。

那时，莫斯科文化生活气氛是独特的。当时，国内战争给国家造成极大破坏，到处是饥饿，使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列宁明智地认识到，要从灾难中拯救国家，只有暂时摆脱十足的共产主义的某些原理，那怕是局部恢复以市场自由竞争为原则的私有制经济。这就是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尽管这一政策不够成熟，但是毕竟是宽容的，其结果是非常好的。

当然，不必把新经济政策理想化，希望能给国家带来繁荣，在俄国出现理想的福地。不，新经济政策给人民带来的生活水平只是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相比较显得稍稍好了一些。国家失业现象严重，街上到处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失去双亲的流浪儿。农民刚刚开始恢复元气，但生活非常艰苦。工人、公务员、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就更低了，尽管不能把这种情况与新经济政策前人民的生活相比较。与此同时，私营企业者，当时被人们称为“耐泼曼”^①，象人们预料的那样很快地富有起来了。琳琅满目的商店只是为这些人开的。高档饭店甚至赌场及其它花天酒地的地方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光

注：①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分子。

顾。一些赶着铺有熊皮毯子的马车车夫总是向他们喊道：

“尊敬的大人！请坐我的马车去逛逛吧！”

我们年轻人都厌恶这种社会现象及人民群众与那些“耐泼曼”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我们当时不能理解，即使是局部地恢复自由经济，其结果也是会客观地起到有益作用的。我们也不能正确评估以自由竞争和个人主动创造精神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中所蕴藏的巨大潜力。而“耐泼曼”的那种只知发财不讲道义的品行是我们感到厌恶的。

随着“新资产阶级”开始巩固自己的经济阵地，同时形成了特殊的社会团体，他们形成一些情趣低下的文化。书店里充斥着低级的黄色书刊，其中大都是译本，但也有些是国内作品。随着高大的、具有传统风格的剧院和追求现代色彩新型剧院的兴建，也建起了一些适合那些暴发户的小市民口味的剧院，饭店里乐队所演奏的流行音乐或流行歌曲等等，所有这些低俗的文化，我们是无法接受的。

当时大学生的物质生活水平极低，我们得到的助学金少得可怜，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同学们的衣着破旧、捉襟见肘。同学中很多人得不到家里的资助，不得不边读书边打工。我记得我也曾在一家私人商店里工作过几个月，每天要步行好几公里，把顾客买的东西送到各家。我没钱买鞋，穿着一双破靴子走在莫斯科冰冷潮湿的大街上。

总之，年轻时代的痛苦还算是容易忍受的，我们仍旧充满热情地生活。革命口号的影响没有消失，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仍坚信共产主义，相信它能给世界带来公正、幸福。我们仿佛看到新生活的曙光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我们感到克服暂时的痛苦和眼前的生活困难对我们来说并不困

难。

在俄国——当然首先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经历的短暂的但是有卓越成就的“复兴”时期中，新俄罗斯文学的产生与旧文学的复兴，更增添了年轻人尚未消除的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

宽容的新经济政策多少导致了对外政策的松动。不过，这种宽容是微不足道的，至少在那些直接涉及到意识形态、政策、苏维埃国家社会结构的部门是这样。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世界观问题、特别是在有关具体政策方面问题上的自由辩论是根本不允许的。同党的“总路线”略有背离之处就要遭到压制或象以往那样被难以容忍的态度予以铲除，虽然如此，国家在精神生活方面是接受党的“领导性指示”，或服从某些负责人的管辖的，但这并没出现过象以后斯大林在位时期所施行的那种粗暴方式。当时还没有借高尔基的手，对文学、艺术、科学一律以人们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实行强制要求。高尔基象痴人说梦一样，要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思想作为文学艺术唯一必须遵守的形式与内容，而这种想法尚未形成法律条文，所以文坛上还有几分生气。

国家物质状况的改善，思想专制的缓和带来了文学、戏剧的复兴是短暂的，但是繁荣的。这个时期，文学界有一个年轻人的小团体，名叫“同路人”，他们都是些才华横溢、风格不同的作家，但该团体名称的性质是含糊不清的。其成员有巴别利、奥列沙、蒂尼亚诺夫、布加可夫、巴格里茨基、普拉托诺夫、佐谢科、曼德利什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其他许多人。他们共同的宗旨似乎只是不想成为苏维埃的盲目的宣传工具，在创作中保持自己一定的自由，但他们与官方所宣

传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目标大体上是相同的。说实在的，他们并不是党的同路人，而是奔向自己的目标。对他们，领导者只能暂时忍让甚至有时还予以表扬。但他们都按自己的理解去认识近年来发生的这些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在苏联人民精神生活和心理上引起的变化。

当时，在戏剧界旧俄罗斯戏剧艺术中心如莫斯科的艺术剧院、小剧院、列宁格勒的阿列克桑德鲁剧院都已失去了艺术的光彩，它们仅保留传统的导演与表演技艺，并把这一传统演技带到那些新上演的一些戏剧中。

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的前身是艺术剧院下属的一个演出团。该剧院最熟悉传统演技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风格，而契可夫的创作风格就象昙花一现，一晃而过，这一点如同契可夫本人的遭遇一样。在文艺创作兴盛时期还有叶夫盖尼·瓦赫坦戈夫的戏剧，尽管这位著名的大师年轻时就死于肺结核，但他仍培养出了一大批有天才的导演和演员，他们在以他名字命名的戏院里继承了他的艺术风格。由А.Я.塔伊罗夫创建、领导的室内剧院继承了上层戏剧艺术传统。最后一位俄罗斯女悲剧大师阿莉萨·科奥涅曾在这里工作过，她演过的角色人们至今难忘。由索洛莫·米霍埃尔斯创建的犹太戏剧在莫斯科戏剧史上也占有显要的位置。

这些剧院在继承俄罗斯古典戏剧风格的同时，自身也充实了新的内容。许多赋予创新、敢于寻求戏剧创作新方式与新途径的剧院和戏剧学校出现了。所有这些——从谢尔盖·埃伊杰什捷伊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到位于阿尔巴特街某个摄影专科学校中的福列盖尔的滑稽五角表演团都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并作为戏剧艺术革命风格的楷模。

显然，麦伊尔霍利德在新戏剧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创建了剧院。莫斯科戏剧界的年轻人认为他是最有吸引力的人物，把他视为灵感的源泉。人们吸取旧俄罗斯文化中精美的部分，其中之一就是戏剧文化。麦伊尔霍利德是竭力主张摆脱传统风格去寻求新的艺术形式与内容的人，他那抗争精神的个性是与革命相适应的。他力求创新，攀登戏剧艺术的顶峰，追求表现主义手法，这些是在革命浪漫主义理想中体现自身的存在。他倾心于暴力斗争，倾心于破除旧传统，但他却和我们大家一样没有冷静地考虑一下，在这种浪漫主义精神背后将酝酿出多么可怕的后果。

麦伊尔霍利德是一位非凡的大师。他对戏剧情节的天才的处理是人们所预想不到的。他善于创造振奋人心的舞台效果以及他创作的给人心灵以极大震撼的戏剧都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麦伊尔霍利德对莫斯科整个戏剧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这些戏剧学校的学生、年轻的演员、导演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导师和楷模。我们投身麦伊尔霍利德剧院，崇拜他的技艺和他导演的那些戏剧，如“忠厚的戴绿帽子的人”、“恐怖的大地”、“怒吼吧，中国！”以及后期的格里博耶多夫的“聪明误”，这些作品至今历历在目。

过了几年，麦伊尔霍利德的剧院被查封了，而他本人也遭拘捕，后受到政权的制裁。可那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大师落得这样一个可悲的命运。这便是我到莫斯科后所体验到的文化生活的大气候。现在我难以形容当时那种感受——清新爽朗、兴奋热情、坚信理想的未来、对一切人类文化财富的迷恋，当时在国立卢察那尔戏剧学院和麦伊尔霍

利德的剧院中，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

克里姆林宫和它的新居民

20年代初我到莫斯科时，住房紧张状况还不很突出，只是后来才变得尖锐了。革命年代首都人口明显减少了，所以城里有好多空房子，原来的房主不是逃亡了就是死了。这些房子很快就搬进了新住户。大房间被木板隔成小房间。苏联公用住宅有其特有的生活方式，厨房与卫生设施是公用的，经常发生争吵，完全没有西方的那种隐私。我也很快在这些公共住宅中分到一小间房子。这些房屋都建在市中心库兹涅斯基大桥边，但我几乎没有使用过这间已被证实属于我的房间。在国立卢察那尔斯基戏剧艺术学院里有一个叫娜塔丽娅·费德洛芙娜·克拉希科娃的人，她是彼得·克拉希科夫的妻子。她的丈夫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她自己也是一位十月革命前就入党的老党员，当然她也是该院党的领导人。她总是以一位老同志、党的教导员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校内她是一位倍受尊重的人。

但使我不解的是，不知为何克拉希科娃竟象母亲般地疼爱我。她身边没有孩子，和前夫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一个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许是克拉希科夫夫妇生活孤独，因此才可能与我这个孤苦零仃、没有人保护的但充满热情的姑娘有密切的联系。应该说我对他们不仅是热烈的爱戴而且还怀有深深的敬意。彼得·克拉希科夫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和朋友。在我眼里的他是英雄主义和忘我精神的化身。

后来，我成了克拉希科夫家的养女，并和他们在一起过了很多年。1931年我和我丈夫搬进新建的政府公寓。这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到他们那去，并开始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后来在1938年，斯大林让他们搬到了政府公寓。

虽然在官方的共产党党史中没有涉及到这一点，但正象克拉希科夫和其他老布尔什维克和我讲过的那样：事实上真正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由“六人小组”创建的，其中有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妻子）、克日扎诺夫斯基、瓦涅夫、拉德切科和克拉希科夫。后来他们构成了布尔什维克派核心，现在称之为共产党。建党时，该小组中的5个人包括列宁，他们的党龄应从他们1893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同盟时算起，而克拉希科夫的党龄是自1892年算起，所以，克拉希科夫的党龄最长，这在苏联论资排辈的制度中是很重要的。

克拉希科夫是西伯利亚人，出身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①，他身材魁梧高大，相貌与举止常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或几分高傲的感觉。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十月革命前，克拉希科夫竟能相信奥地利政府，为在维也纳被捕的卡尔·李卜克纳西^②作保。他文雅的举止以及他对周围人们所持的那种俄国贵族的风度，都使他区别于那些绝大多数是贫民和非贵族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就其个人文化水平来说，他要比其他人高得多。十月革命前他毕业于大学法律系。当他在彼得堡以公开身份居住时，他常为工人的事去法庭打官司。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学识渊博，有许多藏书，喜欢音乐，并拉得

注：① 边区中心。

② 威廉·李卜克纳西之子。